

西侯度石制品研究感悟

□ 卫 奇

西侯度遗址是中国最先发现的一处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贾兰坡和王建所著《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相当重要的一个研究成果。

遗址是王择义等 1959 年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而引起注意的,1960 年 6~7 月贾兰坡领队对窑河遗址进行野外工作过程中,同时在西侯度遗址进行了采集,除了发现代表更新世早期的粗面轴鹿(*Axis rugosus*)和步氏真梳鹿(*Euctenoceros boulei*)外,还找到了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1]。1961 和 1962 年,在由王建主持,陈哲英等参加的两次发掘中,发现石制品“人工痕迹清楚或比较清楚的 32 件标本。”^[2]

西侯度遗址的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最新古地磁测定其年龄为 127 万年^[3]。但是,西侯度的石制品长期存在争议,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难能可贵的一场学术讨论。

1. 关于石制品性质的争议

关于西侯度遗址的争议主要是石制品的性质问题,也就是其标本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产物。西侯度石制品之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超中国当年的“曙石器”论战。在发表的西侯度遗址原始报告中,总共记述了 32 件石制品。关于这些石制品性质的争议大体可以分为肯定(包括部分肯定)、模棱两可和否定(包括基本否定)3 种不同的观点(表 1)。

表 1 显示,历年来关于西侯度石制品性质的争议主要是来自张森水的质疑和李炎贤的评说。据报道:“西侯度地点出土的石质标本,从发现之始,即有争议。”^[4]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发现 30 多件石质标本,经贾兰坡教授等研究后认为它们是人工制品。裴文中教授等则对其人工性

质持怀疑态度。”西侯度的石制品实际上就是“曙石器”(虽未直接见诸文字,但裴氏曾口头明确表示过)。^[5]裴文中对西侯度石制品的异议,唯一可查的文字记录,见于裴文中和张森水 1985 年发表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记载:“在华北,已经报道了若干比中国猿人文化早得多的‘旧石器文化’,就我们所知,或因‘石器’人工性质无法肯定,或因产石器的地层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因之,关于华北早更新世旧石器的研究仍需今后努力工作,目前无法肯定。”^[7]其论述暗示了西侯度的石制品,可能代表了裴文中曾经有过的观点,但其所说不可能是裴文中所言,因为裴文中讲话的风格是坦诚直率,而且,1981 年在医院病榻上生命最后弥留之际曾经仔细听取过笔者关于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地层调查的汇报,也仔细抚摸过东谷坨下更新统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并且予以肯定认可的态度^[8]。当时裴文中已经意识到了北京猿人“最古论”的问题,他曾经特别表述过:“我原想改正一些错误,但我个人的偏见,因多年坚持惯了,很难改正。”^[9]况且,1985 年出版的《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系张森水一人执笔撰稿也是不争的事实。

2005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在西侯度后地口(6053W 地点)附近相关地层中进行了正规发掘,出土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标本 1500 余件^[3]。当年 10 月,在河南举办的织机洞遗址与东亚旧石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益人介绍了西侯度遗址 2005 年的新发现,得到了张森水的赞同,并给予“本次会议杀出两条黑马”之一的评价。

李炎贤对于西侯度石制品的评论较多,但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只是在他最后有关论说中稍露有倾向性端倪,认为“有几件痕迹较为清楚,很像是人工打击的石块”^[31],而且,曾经引述过贾兰坡等 1962 年

表1 关于西侯度石制品性质的认识

观点	作者	表述内容
肯定	全部肯定	贾兰坡和王建(1978) 石制品 32 件,包括石核 7 件;石片 8 件;器物(刮削器、砍砸器和三棱大尖状器)17 件。 ^[10]
		李壮伟和尤玉柱(1981) “西侯度遗址的石器达数十件,但由于它们埋藏于砂砾层中,不少石器受到冲磨”。 ^[11]
		贾兰坡(1989) “这是目前在中国已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石器地点”。提出“西侯度文化”。 ^[12]
		陈哲英(2000) “除一件三棱大尖状器外,另外 31 件标本磨蚀都较为严重,以至于一些破损痕迹已很难区分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了。”“有些标本的人工性质也还是非常明显的。”三棱大尖状器(P4072)可能出自西侯度文化层之上 8 米高处的浅红色粉砂砾石夹层中,其“地质时代应为中更新世”。 ^[13]
		王建和王益人(2004) “西侯度遗址石制品的性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任意改变的,更不能以一己狭隘的偏见所动摇。” ^[14]
		王益人(2007) “西侯度石制品虽然受到河流搬运埋藏的影响,但人类行为及其特征毋庸置疑。” ^[15]
	部分肯定	黄慰文和侯亚梅(1996) “一些石制品”“很难用自然成因来解释”。 ^[16]
		J. D. Clark 和 K. D. Schick (1988) “大部分标本的棱脊显示边缘修饰,但因为标本的严重磨损情况,其修饰可能由强流水冲蚀引起,虽然石片好像是有意制作的。”“这样严重滚动的一个例外是一件大型的单面的以唯一不过度磨蚀的略为平状石英岩砾石制成的尖状工具,可能与大部分动物化石来自砾石层顶部。” ^[17]
		卫奇(2000) “报道的 32 件标本中挑选出 11 件作为石制品记述,其他 21 件标本有可能是断块或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其属性尚需进一步认定。另外还有 3 件未曾报道的标本也一并作为本文的观测材料。” ^[18]
	模棱两可	邱中郎和李炎贤(1978) “1960 年,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发现属于早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化石和几件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19]
		李炎贤(1979) 对石制品的性质没有表达有倾向性的意见。 ^[20]
		李炎贤(1999) “对石制品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同意见(李炎贤,1979)”,认为“张森水的论文是值得重视的,尽管还存在论证不够充分的地方”。 ^[21]
		李炎贤(2002) “多数标本有水流冲磨的痕迹,人工痕迹模糊不清,难于辨认;但是也有几件标本痕迹较为清楚,极有可能是人工打击的石块”或“很像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22]
		李炎贤(2003) “多数标本有流水冲磨的痕迹,人工痕迹模糊不清;但是也有几件标本痕迹较为清楚,很像是人工打击的石块”。 ^[23]
否定	基本否定	J. S. Aigner(1978) “根据标本的形态特征及其相关情况的了解,Hans-Dietrich Kahlke 怀疑它们是人类作用所为。” ^[24]
		Li Yanxian (1983) 转引了 J. S. Aigner(1978)的表述。 ^[25]
	完全否定	裴文中和张森水(1985) 暗示石制品“人工性质无法肯定”。 ^[26]
		张森水(1990) 暗示石制品“性质存疑”。 ^[27]
		张森水(1997) “对被认为是石制品的标本性质,从发现之始,就存在不同认识,中外学者怀疑它们是河流碰撞所产生者不乏人在(裴文中、张森水,1985;Clark and Schick,1988)。” ^[28]
		张森水(1998) “西侯度出土的石质标本,从发现之始,即有争议。其上有明显的水流碰撞和磨蚀痕迹是客观事实,中外旧石器考古学家对原研究者认定的石制品提出质疑是从实之论。”“河流碰撞所产生的碎石的形态、疤的特征都可以与《西侯度》‘石器’进行对比,其中有非常相象之处,因此,要肯定西侯度的石标本是人工制品还是相当的困难,过早地定论似乎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29]

的观点^[30],也将西侯度地点作为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信息看待^[31]。

上述可见,关于西侯度遗址的石制品,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

2. 西侯度石制品之争的原因

认识事物,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做学问必须勇于思考善于思考,能够发现问题,敢于解决问题。科学研究的成功常常建立在失败基础之上,如果怕犯错误而不愿思考,懒于思考,或不敢思考,讳忌思考,则无助于科学进步。

“一疑一信相参勘,勘极而成知者,其知始真。”(《菜根谭》)科学巨匠达尔文说:“富有怀疑态度,这对科学家是有利的。”“对于别人的论断,我并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我始终努力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以便一旦事实明显地相左于我深爱的任何假说时,马上就放弃这个假说。的确,我只能照此办法去行动,别无他径可选择。”(《达尔文回忆录》)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说:“学问、真理,就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发展的”;“指名的批评比不指名的批评要好,因为指名的批评必须有根有据,不好断章取义,而被批评者也可以进行说明或者反批评”^[34]。

其实关于西侯度石制品之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2.1 因磨蚀严重而被置疑

认识石制品磨蚀,必须明晰石制品和磨蚀的逻辑关系,分清砾石磨蚀和撞击的基本概念。

众所周知,石制品和石制品的磨蚀属于包容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而且磨蚀是石制品的非本质属性之一。磨蚀的轻重反映石制品在后期地面暴露时间的长短和搬运距离的远近。因此,石制品不管磨蚀程度如何,只要尚存可以辨认的人工痕迹,它的石制品的本质属性就没有改变^[39]。只有磨蚀得不显人工特征的石制品,如果没有足够的辅佐考古证据就很难再论为石制品,因为石制品和砾石的岩石自然属性是一致的。

西侯度的石制品出土于砂砾石层中,笔者认定的14件标本中,磨蚀程度(级略有磨蚀)的1件,级(磨蚀中等)的4件,级(磨蚀较严重)的6件,级(磨蚀很严重,但尚可辨别人工特征)的3件^[39],除了一件三棱大尖状器(P4072)磨蚀程度较低外,其他标本大多数磨蚀比较严重和相当严重。西侯度石制品发现于河流砂砾层中,通体磨蚀均匀且光滑,表明石制品经过了一定距离的搬运,应该属于水流滚动中磨蚀的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西侯度遗址属于河流沉积中的次生遗址^[37]。真正的西侯度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能位于其附近砂砾石层占据的古河谷上游某一段谷底,即当时平水位时期的河漫滩或低水位时期的河床浅滩。石制品不同程度的磨蚀表明西侯度遗址在古河谷分布具有较大空间长度或/和石制品组合占有较大时间跨度。

类似西侯度石制品的发现在泥河湾盆地也有多处,例如黑土沟、葡萄园、广梁和霍家地等。其中霍家地,笔者在1991年曾经带领美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J. Desmond Clark等观察过,他们对其石制品做出了“自然的”判断,但是后来经过试掘,从中发现了人工特征明显的石核和石片,事实证明霍家地是一个含有人工石制品的考古遗址^[39]。

水流中滚动的砾石相互磨擦和受跃动的砂粒冲磨,经过一定距离搬运的砾石会有不同程度的磨圆和按照粒度大小的分选。水流中的砾石顺着冲力、重力、浮力和科里奥莱力的合力方向运动,彼此的撞击作用远不及相互磨擦,即使不同质量的砾石在滚动中因速度差异而出现撞击,如果动力方向不是向着砾石重心,而是偏离其重心,那么其砾石只能在一个力矩的作用下加速转动。砾石,尤其是坚实的砾石,互相撞击产生破裂是有难度的。1984年

大年初一,笔者随同黄慰文在四川攀枝花的金沙江河谷调查,在河滩,没有一件破损的砾石被发现,就地采集砾石剥片,锤击和碰砧无能为力,摔击,砾石竟然蹦起2米多高,依然无果。可见,砾石在流水中撞击,产生剥片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笔者在长江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发现,在河流砾石层中可以鉴别的石制品,分布范围较为集中而有局限,除极少数石制品单个标本存在两个甚至三个磨蚀不同等级的剥片或修整疤外,绝大多数石制品,单个标本表现为一个等级的磨蚀,尽管群体标本呈现出各个不同等级的磨蚀。这一现象,意味着它们形成后就再没有产生破损,而各自只有经历不同程度的磨蚀,即显示它们只有长短不等的磨蚀时间或远近不等的搬运距离。依据逻辑推理判断,砾石如果是在水流中撞击破裂或破损,那么在同样水动力条件下形成的破损砾石应该分布范围大,数量多,密度均匀,而且大多数石质标本应该有不同时间段的连续多次撞击痕迹,绝不可能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只有少数砾石固定在某一地段和某一时段产生撞击破裂。这是鉴别西侯度石制品人工性质的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关于河流砾石的破损,迄今所有表述仅仅停留在宏观的感性认识上。如果对不同时代的砾石层做专门的定量分析研究,也许会给出一个崭新的真实观感。

2.2 受北京猿人“最古论”的束缚

科学理论常常由杰出的科学家导出,它能作用于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也能影响一个时期或时代的许多人。正确的理论能够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但错误的理论却会导致科学的停滞不前,有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曾记的,2003年3月17日,SARS爆发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然而4月25日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仍然发表一位院士的衣原体病源说,作为权威结论一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在中国存在几个月,致使中国科学界失去了一次崭露头角的独一无二的黄金机遇。美国科学明星何大一说过:“中国人太尊敬老师或长者的意见了。”其实,这是科学制度酿成的后果。这个教训,无不令人深感痛切。

在科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发现开始受到非议或压制,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器发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裴文中说:“1930年时,

我在龙骨山的山洞中发现了许多石英。据我个人看来,是有人工打击的痕迹的,于是我采了许多。带回北京,洗刷之后,陈列出来,请我们同事们来查看和研究,有一位同事,看了之后,好像是非常生气,立刻就拿起一块石器来在其余的石器上拼命地打,他口中说:这样的碎石头,马路上多得很!’我自己耐心研究,再作试验,证明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有人工打击的痕迹,哪一个地方是天然破碎的痕迹。我这样的研究,始终不能说服同事中的几位先生。后来于1931年秋,才请来了法国史前学的权威 H. Breuil 教授,经他的证明,同事们才信服了我的说法。”^[39]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虽然非洲早期古人类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在中国匭河遗址发现后,在中国古人类学界却引发了一场学术辩论,争议的焦点是在北京猿人之前是否还有更古老的人类和石器存在,即匭河文化是否比北京猿人文化早^{[40][41][42][43]}。这一争论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看来争论的双方都是赢家,因为后来的许多早更新世旧石器的发现证明北京猿人“最古论”的观点不能成立,而匭河遗址的时代也应该晚于北京猿人遗址^[44]。

由于受北京猿人“最古论”的影响,西侯度遗址石制品的发现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地层结构及其化石哺乳动物群特征决定了遗址时代的古老性,所以磨蚀严重就成为石制品人工特征被质疑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当时世界人类演化的理论也不认同中国下更新统古人类的存在。过去,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会制作工具的人类进入亚洲仅仅是100万年前以后的事情,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的科学家参与了泥河湾盆地东谷坨下更新统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研究后,中国存在早更新世人类遗迹的事实才逐渐被普遍接受。

2.3 偏见的影响

偏见,人们一般会理解为片面不公正的见解,因为商务印书馆编的《辞源》(1988年版)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偏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修订第2版)首要解释为“偏于一方面的见解”,具有中性词的一面。

科学研究有学派,学派的学术之争有益于科学进步,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可以打破狭隘的门派观念和消除学术偏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过去的时间内有过门派,而且也有过发展的强化。过

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很多研究人员没有受过名牌大学科班的专业训练。因此,有关人及其作品受偏见的舆论,自有情理,实属社会和谐常态声音。

在科学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往往比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更有开拓创新的活力。科学研究的经验积累和借鉴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发明创造的能力并不完全与经历的长短和经验的多寡成正比,依赖经验的循规蹈矩恰恰对于科学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经验使人失去的东西往往超过给人带来的东西。半路出家的被认为是还没有入门道的勇敢者之所以更容易做出巨大突破性的创新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朝气蓬勃,能动性大,机会较多,感受敏捷,认知明快,接受新鲜事物较少受到传统经验的条条框框的影响和束缚,更少保守思想,因而更适合推陈出新,超越常理,出奇制胜,做出新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因为科学创新需要善于取舍经验、需要敢于突破经验的自由心灵。因此,从多年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中国目前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才培养学制太长。如果进行教学改革,从高中直接选拔学生,经过专门强化训练,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学士到博士的全过程学业,应该是有可能的。

科学作品的优劣,经历时间长河的冲磨和分选,必然会无情地重新排列组合,历史的裁决是最公正的。著名画家吴冠中说,作品,只有人(作者)死后,人事关系不存在了,才能表现出真正价值。而且,他在画作走红之际,毅然将自己不称心之作撕毁。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有大量谄媚之作,晚年感到羞愧,刻诗集特别声明:“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因此,做学问必须立其诚,科学家应该人以文存。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文以人存现象却屡见不鲜。

在关于西侯度遗址石制品性质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在此时期,在中国首次发生了所谓的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讨论,实际上是与上述讨论密切相关的,故有人从讨论问题的实质出发,称其是中国第一次‘曙石器’之争。”^[45]在此时期”,确切时间是1962年。当年发生争论的焦点虽然是曙石器,但具体内容却是讨论匭河遗址比北京猿人遗址时代早的问题,对西侯度石制品的疑义仅仅是圈内人的意会而已。所以,1962年的“曙石器”之争,名不符实,因为

争论的双方对于匭河石制品的性质均无异议。因此,真正关于西侯度“曙石器”争论的文字记录应该始见于张森水 1998 年发表的《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一文,该文明确对 1978 年贾兰坡和王建所著《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提出了全面置疑。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针对这场学术讨论,笔者有幸听到过一位古生物学家的一席发人深思的谈话,大意是如果裴老的博士论文(Pei, 1936)早一点译成中文发表,可能会避免这场争论。”此话考证应该发生在 1990-1996 年之间,因为裴文中的论文是 1990 年由盖培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译文《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节译)》被收录在《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第 51-77 页,而所指的“一位古生物学家”1996 年初去世。其实,辩方清楚知道西侯度报告在“处理西侯度这批材料时,为了避免在判断上发生错误,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诸如地层下压、断层错动、冰川作用、泥石流移动、洪水冲击、漩涡滚动、野火燃烧、气温变化、酸性腐蚀、水的溶解、野兽践踏等所能引起的岩石破碎也做过考虑。”^{[46][47]}而且,1965 年出版的周明镇翻译的 P. Kenneth Oakley 名著《Man the Tool-maker》中文本,其中有关于曙石器的介绍,贾兰坡 1956 年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似石器和非石器》一文和 1957 年发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也有关于假石器论述。其言论,无不显示出对实际研究情况和对贾兰坡在假石器方面历练的漠视,不仅没有达到所设计的效果,反而流露出固执偏见: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笔者坚信,裴文中如果能健康再多享一年或两年人生,那么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书中对于华北早于北京猿人文化发现的存疑,就不可能会出现。因为,泥河湾盆地小长梁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 1978 年发现后,裴文中指出:“这个发现是重要的,如果能证明它确是泥河湾期的产物,这将对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有一定的革新作用。”^[48]1979 年裴文中还不畏年迈体弱亲临实地进行考察,并且在 1981 年组织领导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队,点名卫奇和孟浩到小长梁遗址一带协助进行专门调查,结果,不仅查明了小长梁遗址所在地层确系“泥河湾层”的下更新统部分,而且在小长梁遗址上覆相接近的层位里还发现了东谷坨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

1950 年,裴文中在《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再版

序言中写道:“我不希望,也不可能,我这本书成为一本史前考古学的‘万事不求人’或者‘无师之通’之类的书籍,且史前考古学也决不是读一本两本书,即可成为‘专家’,可以独立工作和研究。”^[49]其言博大精深,继承了中国道家的“大成若缺”思想,毫无影射责备他人的含义。但是,有一位在中国享有最高研究水平声誉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却假借裴文中的这段话宣泄愤懑:“时间过了四五十年,当年的‘专家’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谁想最近十来年来居然又出现了这样的万事不求人、无师自通的‘专家’,照样进行‘独立工作’和‘研究’,照样洋洋得意。这是裴老始料所不及的。但这样的‘专家’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50]显然,这位先生对裴文中的表白缺乏准确的文法结构理解和正确的逻辑思维判断,望文生义,不仅曲解了裴文中的原意,而且流露出骄矜的偏见。所指“当年的‘专家’”是谁?“当年”,应为 1950 年之前几年。当时,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只有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人。从文章逻辑推理,这个“专家”非贾兰坡莫属。但是,就在 1950 年,裴文中为贾兰坡的文著作序时说:“我底二十多年的老同事贾兰坡写成了一本‘中国猿人(北京人)’,……写这本书,贾先生是最合适的人。在二十年前,贾先生最初参加周口店发掘工作之时,对于这一类学问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但经他不断地勤恳努力学习,到现在已经成了我国不可多得的专门人才了。他在野外工作的时候,一点不肯松懈,抓紧了时机,尽力追求;野外工作休止的时候,更努力在学校中听课,在研究室中读书研究,二十多年,勤劳奋勉,始终如一。他今日的成就,很可作许多青年人的榜样。他不但可以用他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把他亲手的工作和心得写出来,供人参考,而且可以表现出他坚毅苦干的精神,足供他人学习。我觉得一位大学毕业生曾到外国专门研究过的学者,若写出这样一本书来,是应当的!但像贾先生完全自修的人而能写出这种著作,实在是‘难能可贵’。”^[51]这是当时裴文中对贾兰坡的真实评价。笔者认为,贾兰坡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很有影响的已故老前辈之一,虽非完美无缺,但至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唯一获得三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学者,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历史功绩,应该予以肯定,学术上的不足之处,指出来尚可以傲效尤,也不失对他的尊敬,因为,科学研究就是修正过去的

错误和填补空白,前人理所当然是后人的靶子。但是,如果囿于成见无端指责,既违背做科学的理论道德,也显得庸俗而有失学者风范。“最近十年来”,也就是在大约 1994-2004 年之间,居然又出现了这样的“专家”,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指 20 世纪 90 年代参加工作的年轻学者;如果文句不存在语法问题,那么依据其举例和其他相关的文章判断,所指的人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经过交叉定位检查,所展示的问题却令人匪夷所思,有的是张冠李戴或凭空想象,有的是误解和误判^{[52][53][54]}。说实在的,做学问的常规是“为解无知入门来,入得门后更无知。”无疑,这样不实在的批判,既不能彰显大家所期望的学术水平,也无法给人所期待的有益教诲。

更有立论认为:“西侯度石质标本问题是检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试金石,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可回避的问题。”^{[55][56]}此说以为从西侯度石制品的认知能鉴别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真假,显然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常理,因为科学家的成功常常是从失败中取得的。饶有趣味的是,在中国,曾有真假石器之争的遗址或地点除了西侯度之外,还有河北省迁安县爪村^[57]、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泥河湾盆地河北省阳原县下沙沟、马圈沟 Me-g 马圈沟 -)、霍家地和蔚县大南沟东陡壁等,其争论的双方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知名度很高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甚至有的在不同地点充当反串角色,而且有的判断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妥当的。因此,“试金石”论如果能够成立,那么检验结果无非不过,中国只有立论者一个人才是真正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很显然,“试金石”论是特制标准,有失公允。在科学活动中,如果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还兼规则制定者,并且还要置身于局外充当记者和观众,那么科学研究至公至平至真至正的理念支柱就必然会发生人为的倾斜。

裴文中曾经在 1948 年指出:“将来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的知识增加了,然后方能谈研究之结果如何。现时有许多问题,我们限于所知,无法解决,或与他人之意见不同,我觉全是无法避免的。我希望国内诸先辈及朋友,多加指正;我更希望我们后学者,多从事实工作,少作理论上的推测。后辈人若能如此,方能使我国的史前考古有进步,将来有发展;若专就诸先辈之工作范围内研究,及谆谆在前人工作报告上作文字的推敲,则完全失去了这种学术的精神。”我相信:许多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绝

对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觉得作任何学术上的工作,我们绝不可包而不办,办而办不到好处。但是看一看我国学术界情况如何?……这类人又多‘小心眼’,自己不能作研究,而又常嫉恨旁人作研究,更嫉恨研究有成绩的人。这类人有权势,有党派,有时更可使学术研究工作之人被压在不工作之人之后。指导、协作、及合作,皆不能谈,除非是寄生在这样的人卵翼之下,或加入他们的党派。”中国学术的不发达,是学术界自己不争气。在今天,绝对不能再“文人相轻”,即不能自己不作事,而嫉恨旁人作事”^[58]。

学术批判必须是惩前毖后,奉爱心,说真话,献才艺,以理服人。对于过去的研究,容当客观对待,哪些是值得继承的需要发扬光大,哪些是有缺陷的需要考量矫正;对于现在的研究,容当熟思审处,哪些是前瞻性的需要有渐无已,哪些是有弊端的需要查源截流。“识见议论,最怕小家子势。”(《呻吟语》)“心隘,则一发似车轮”(《菜根谭》),如果闻过则怨,理智失控,采用不得体的言行进行抨击,这样不仅有失学者身份,而且也有悖学术讨论,更负于众人所望。

旧石器时代考古属于探索性科学。然而,人生有限,学识无涯,对旧石器时代的了解需有一个相当长期的资料积累和不断摸索过程,通过一个遗址或地点的研究试图解决什么重大问题作为愿望追求是美好的。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山外有山,研究思想是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是全方位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鹪鹩巢于森林,不过一枝;堰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研究者能在科学领域所占的一席之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踏踏实实辛勤耕耘,努力奉献便足矣。“君子不尽利以遗民”(《礼记》),平等竞争是很值得提倡的科学风尚。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论什么人,也不论是否有过什么重大失误,只要对科学进步有所贡献,就应当予以正面肯定。文以人存的执著偏见往往会偏离真理更远。

3. 关于西侯度石制品研究的思考

3.1 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西侯度遗址从发现到研究报告发表,经历了长达 18 年的缜密考究,它是追求真理求实的典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元谋猿人发现前中国早更新世有关直立人的化石信息尚属空白,而且当时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被笼罩在北京猿人“最古论”的学术理论

氛围,它的发现,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受到怀疑,而更有地位较高的学术权威给予全盘否定,压力是巨大的。但是,西侯度的研究者根据自己对北京猿人旧石器的分析判断,坚信中国早更新世泥河湾时期存在比北京猿人文化更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60]。他们在正确的科学信念指引下,不畏艰难,使消极的压力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使外界舆论变成对照检查问题的镜子,不屈不挠,踏踏实实,认真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完成了西侯度研究的伟大创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史上留下了格外显目的一页。

西侯度遗址的研究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楷模。报告中记述的32件石制品中,有1件三棱大尖状器,系砾石一端单向加工而成,尖端具有5个明显的修整疤痕。这件标本的人工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尽管有人对它也表示存疑。贾兰坡和王建记述这件标本“是从西侯度人圪塔6053地点含动物化石和石器的地层附近拣拾的,已经脱离了原生地层”,判断来自相同的文化层^[61]。在当时人们对西侯度石制品非常存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如实记述,显示出科学家心术诚恳的高贵品格,其精神十分可嘉,很值得崇尚。

后来陈哲英根据当年野外工作日记的记录,认为这件标本可能是在6053西地点东约100米处中更新统红色土所夹砾石层之产物^[61]。虽然未能十分肯定其判断,但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由于自身缺乏严密有序的研究规范系统和对遗址严格的科学判断标准,出现一些技术差错和判断失误委实难免。不过,科学人丝毫不得弄虚作假,而且还有责任捍卫科学的尊严。学术以光明笃实为重,实事求是乃做学问的准则。制假,不仅丧失了做科学人的底线,而且也降低了做人的人格。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令人发指的科学大骗局,例如英国的“道森猿人”造假事件,菲律宾的“塔萨代部落”虚构事件,日本的“藤村新一”石器埋藏制假事件。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也不是一片净土,令人惊诧的现象近年时有所见。有的学者将地表采集的标本说成是发掘出土的。最近揭露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有的论文中以虚构事实作科学论据,无疑属于学术造假行为^[62]。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中,人为制造的假象实不少见,笔者在泥河湾盆地和三峡的调查过程中,为了弄清真相,曾经付出了不少

辛劳。

为世人有目共睹的“野人”之谜,炒作经久不衰。实际上,它的运作基础无不与国家科学研究部门的人类学家参与以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有染存在丝缕瓜葛。然而,作为人类学家,特别是对于荣享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人类学家来说,应该明白一个物种的自然繁衍必须以种群形式存在的道理,将一些不实的信息作为科学根据进行判断,有失科学的尊严;作为专业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来说,应用科学的侦探方法,几十万年,甚至一两百万年前的古人类遗迹都能发现,寻找现代人类的足迹相对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有染的科学家,不能以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指导探索活动,客观上误导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劳民伤财运动^[63]。

3.2 基础研究

在西侯度石制品的争论中,专家们呼吁:“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辨别真假石器方面,更应长抓不懈”^[64];“要加强基础研究”^[65]。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看起来是小事情,但关系重大。小处不可随便。这些存在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钻牛角尖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这门学科基础和整体水平的问题。”^[66]

有人指出:“从《西侯度》中,可以看到,若干论证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对比的资料实近如缺,从中反映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辨别真假器物方面做的不够,难免不发生‘曙石器’之争,我们不妨把这些工作看作是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说《西侯度》问题的讨论远没有由此所引出的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辨别真假器物方面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针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加强基础研究,首先要抓对似石制品的非人工制品的研究”^[67]。

裴文中倡导旧石器时代考古四条腿走路的方针,即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古哺乳动物和第四纪地层四个方面一起抓。诚然,基础研究是多方面的。过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来自非考古专业,就是来自考古专业的所学知识也很有限。因此,旧石器时代考古人员的基础知识和研究基础不足已经先天注定,后期的学习几乎是在实际工作中自己摸索的或徒弟跟师傅模仿

的,其知识的完整性不言而喻。所以,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不足”现象的存在,既有历史传承的原因,也有现实人为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某一部分人是不合理的,将自己置身于圈外指望他人解决问题也是很不负责任的。事实表明,做比说好,正人先正己更好。

人工成因的石制品和自然形成的破碎石块确实有的难以区分。贾兰坡和王建在处理西侯度材料时,他们提出了3条衡量标准:(1)通用的鉴定人工制品的标准,例如石片的要素等;(2)打击痕迹的规律性和重复性以及人工制品的可对比性;(3)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和它的加工特性^[69]。这三条标准对于鉴定西侯度的石制品是有意义的,倘若增加埋藏环境和石制品组合及磨蚀等方面的分析也许更具有说服力。裴文中曾经指出,石器“首先,它们必然不是自然破碎的石片”“它们必是人工打出来的石片,上面有打击点、半锥体、波纹、疤痕等。”^[70]其次,这些石片上要具备一种尖、一种刃或者有一定的重量,可以作为石锤使用。”^[69]其判断只注重石片石器,没有考虑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也没有论及只有一两道工序形成的石器、石片、石核和断块。张森水提出“石制品的最基本的人工要素,就个体标本言,可归纳为向、位和形3点;对群体来说应具有3个多样性”,即“原料的多样性”“品种的多样性”和“石制品类型或形态的多样性”^[70],其判断标准对石制品的概念界定模糊,实际上仍然会把一些石制品排除在外或把自然破碎石块当作石制品。例如,只打一下产生的初级石制品产品,既没有加工的“位”,也难说有一定的“形”,而且打击方向不存在“多向的”或“转向打法”,这样的石制品无疑就被排除在外;而在车来车往的石子道路上,有许多被碰撞和挤压破碎石块,三个多样性却都会存在,这样的标本又很容易误认为是石制品^[71]。笔者曾经提出“认定石制品,必须先弄清楚人类制品的属性。石制品的属性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人工作用痕迹;第二板块是石制品制作形成的特征;第三板块是石制品在后期出现的特征。”“确认人类初期的石制品,在地层层位明确的前提下,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是石制品的人工性质。如果石制品是经过多道工序产生的或加工痕迹明显,一件标本也可以说明问题。对于只有第一道生产工序制成的石核或石片,或者是断块、碎屑、不定型石片,不论是个体标本还是群体标本,必须增加认定的辅助判断标准:(1)理论基础;(2)遗物的埋

藏情况;(3)古地理和古生物化石等方面提供的人类生存环境的信息;(4)人类活动行为;(5)岩石性质;(6)人类活动留下的其他考古遗迹等”^[72]。其说仍需修补,例如再添加一条“7)石制品组合特征。不同性质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应该有所不同,对于单调的石制品组合,例如石片和石核以及断块的简单组合,需要谨慎考虑,是否存在动物行为的因素,因为卷尾猴和黑猩猩一类动物也可以打石片和使用石片^[73]。李炎贤认为“区别人工的石制品和非人工破碎的碎石,最好从标本的最基本的部位分析起,如台面、打击点、半锥体、打击泡、放射线、波纹、背面、棱脊及侧边的疤、石片角、刃角等。每个部位、每个特征都要有量的说明。然后分析其组合情形,要考虑‘环境’、‘时代’、伴出的其他化石或遗物。对发现的标本要仔细研究、慎重处理,切忌马马虎虎,粗粗一看就明白,一看就下结论,急急忙忙地作出‘是’或‘不是’的判断。要力求避免误解、误判。”^{[74][75]}其论说宏明已道,但不能指导实践,和“楚人有鬻楯与矛者”之说,异曲同工。

3.3 石制品分类应该遵循形式逻辑划分原则

陈淳指出:“目前我国考古学界所采用的类型学,较为科学的分类不过是积累经验的应用,而不甚科学的分类则是因人而异的主观臆断。”“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类型学方法并没有被不断系统化和科学化以作为我们增进对过去了解的手段,却被尊为一种考古研究必须遵循的正统模式和一种撰写考古报告的‘八股’。”^[76]

西侯度研究报告中的石制品分类承袭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其分类是不符合形式逻辑划分原则的,例如石核三个类型的划分依据分别为原型、技术和形态,违背了一次划分只有一个标准和划分后子项相互排斥的分类准则^{[77][78]}。后来,贾兰坡等曾经呼吁积极开展旧石器分类学的研究,并评估了旧石器分类工作和提出了旧石器的分类准则^[79]。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界,李氏石片台面分类是一个缺乏逻辑思维的典型范例,尽管创建者20年后否认自己做过分类^[80]。不久前,李氏石片台面分类被重新做了修订,根据石片台面保留情况将其台面从小到大分了4种:1)台面缺失者;2)台面小到不保留“面”(包括“零台面”和“刃状台面”)者;3)缩小的台面“虽然比普通台面小,但仍可以被观察到。包括“点状台面”和“线状台面”);4)“普通台面”。其中普通台面分为:“天然台面”、部分天然台面/部分人

工台面组合成的台面和人工台面三种。人工台面有一个面的,包括无疤的“素台面”和有疤的“有疤台面”;也有两个面的,通常为“有脊台面”;还有三个面的,包括台面不是修理的和经过修理的修理台面^[81]。显然,其修订方案在第一划分层面上就出现了多出子项、子项相容和越级划分的逻辑错误^[82]。

3.4 发掘报告

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必须建立在科学规范的田野考古发掘基础之上。

西侯度遗址 2005 年的发掘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越来越趋于规范,根据发掘记录可以基本达到再现出土遗物的空间分布结构。但是,对于构造复杂的文化层,例如倾斜岩层和侵蚀不整合岩层,目前采用的水平层剥离法会打破自然堆积层的程序,如果控制不好地层变化,很容易出现爷爷孙子同辈的判断,特别是洞穴重力堆积的文化层,甚至会出现孙子比爷爷老的错判。发掘布方采用留隔梁的方法,虽然可以弥补水平层剥离法的一些宏观不足,但仍然会丢失许多细微的文化层结构信息。所以,笔者建议,发掘最好是按照文化层的自然结构顺序依次进行水平逐层剥离。

野外发掘尽可能又多又详细地采集信息,收集资料不言没用或无意义。

发掘报告,如同刑事案件立案侦破后的起诉和判决,它是发掘工作的延伸和从实物资料到文字资料的科学升华,它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建造结构链条上特别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它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大盘。发掘报告属于基础研究,它直接影响理论建造的质量,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就很难有理想的高水平研究。说实在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真正的高水平研究甚少,有的所谓高水平研究,实际是文字的捣鼓,甚至是科学垃圾。

发掘报告需规范格式化,起码的要求,材料记述不仅要具有可视性,需要交待清楚;还要具有可对比性,需要有效记述。不能只注重自己想说什么,需要更多考虑他人希望能看到什么、想得到什么和能得到什么,也需要考虑利用最新技术手段传递有关信息,以便他人能够共享其资源,以及利用其报告作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再研究。倘若在阅读文献资料和分析考古材料中滋生大彻大悟豁然贯通境界,那么科学奇迹的出现也许即将来临,事先要有接驾

准备,因为机遇永远只垂青于有准备拥抱它的人。

“文以拙进,道以拙成。”(《儒解菜根谭》)贾兰坡和王建的西侯度遗址研究报告,虽然属于传统思维的模式,但所记述的石制品,既有可视性,也有可对比性。报告中介绍的“带有切痕的鹿角”和“燃烧过的骨、角和马牙”也值得重视,因为石制品的存在,其伴随鹿角出现人工切痕是有可能的,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南非 Swartkrans 洞穴发现 100-150 万年前的“人类用火痕迹再一次被确认”^[83],对西侯度遗址的可能用火遗迹无不具有理论上的支持力度,但最终确认尚需更多证据的发现。笔者认为,关于西侯度遗物将来可能还会有争论,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西侯度的研究报告是一部有生命力的科学论著,尽管有人说科学论文的寿命只有 20 年。

3.5 学风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元老裴文中和贾兰坡所创建的良好科学作风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很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

科学报告,论点应明确,论据须准确,文字要通达优雅。学术讨论,应该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中肯求是。保护科学环境,尽量不玷污学术圣洁,力戒不制造垃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卫兴华提出治学的四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谨的学风和严密的论证。胡适教导他的得意门生罗尔纲,曾经说:“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对他发表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短评,严厉地责备道:“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传说有位老夫子为二郎庙撰写庙记:“夫二郎者,乃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次子也。……”言表实实在在。这可能是一个笑话,未必真有其事。但是,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中,类似的记述并不少见,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众所周知,西侯度石制品的性质令人关切。但是,关于《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

书评^[84],始终不显示对于石制品的看法,恰似中庸,却中而不和。虽然来说该书评对石制品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同意见^{”[85][86]},但仍然不表露究竟有什么不同意见。

在石片台面研究中,解释平坦打制台面“它可能是平的、凹的或凸的”,大致可能的几种类型都包括在其中,应该属于典型的“庙记”形式;这种台面上的小疤,有时彼此相连,有时则不相连,往往是在台面背缘或侧缘,有时在台面的腹缘也可见到。台面上的小疤形成的原因较多,或者是石片剥落前产生的,或者是石片剥落后产生的,此外还有少数是与打片同时产生的。”这段话,形式上当属“庙记”类型,而且内容更是画蛇添足,多余的话传递了错误的考古信息,因为石片剥落后在台面上产生的小疤已经属于石片特征,作为台面属性看待是十分不妥的^{[87][88]}。

还有研究报告指出:西侯度的石制品“在目前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是不明智的”。同时,对于西侯度的石制品,一面说“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这些标本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又说“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在所有论文中写得比较好的要数贾兰坡和王建先生合作的专著《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和张森水先生专论《关于西侯度的问题》^{”[89]},前后表述是矛盾的。按照逻辑推理,只有其作者自己既不肯定又不否定的文章是最好的,其他人的有关论述,当属“石制品鉴定的误区”的“简单地‘肯定’”的另类。“学者只是气盛,便不长进。”(《呻吟语》)狂妄和虚张当属科学研究之大障碍。“败事多因得志时”(《小窗幽记》),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过:“一个人若自以为有许多成就,而止步不前,那么它的失败就在眼前。”其研究报告从西侯度石制品剖析石制品鉴定的误区,介绍了过去,谈论了现在,指明了未来,论述了辨别真假石器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西侯度石制品性质的态度模棱两可,恰似阴阳先生神算三个赶考秀才能不能考上,只伸出一个指头晃了一晃,肢体语言表明:一个考上一,两个考上则考不上者是一,三个一齐考上一,三个一齐考不上还是一。真有才!实在是高!但这绝不宜与高水平科学研究相提并论。

也有综述性文章,取材选择偏颇,例如,对待自己不认同的发现,不是诚挚地阐明问题所在,而是佻巧地以“本身性质存疑”和“断代证据不足”而开天窗,一概不予评介^[90];论述“近20年来中国旧石器考

古学的进展”,表述的是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乐意接受的研究成果。虽然文章中说“上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二个高潮,但尚未全面论及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巨大进展。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时空的发现和水平都有了长足进展,而且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期间发表的有关研究报告一二百篇,有的科学成果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文章的参考文献只有15篇,而且在此时段发表的不过13篇^[91],从引文不难看出,其论述内容,与客观完整性不可能不存在一定的距离。王益人和王建对于类似现象曾经严肃指出:“所谓‘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仅仅叙述了与张先生相关的考古重大发现”^{”[92]}。如此现象不仅出现在研究报告中,而且也表现在教学、展览和出版等诸多方面。在令人不禁深感遗憾之余,笔者深切希望此风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术领域从此永远成为过去,因为它既无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学术权威的提升锤炼。更有科学论文,不做数据统计,凭空设想“多数”“大多数”,甚至把“少数”说成“多数”;缺乏逻辑思维理念,颠倒石片分类和石片台面分类的属种关系,分不清岩石和矿物的彼此关系,理不清属于化学硅质岩中的水晶、玛瑙、燧石和蛋白石等与沉积岩的相互关系;混淆事物概念,把石片台面当作石片表述,把石片分类看成是石片,把“或”理解为“和”;还有在举证不全的情况下就断然给人定性“抄袭”,甚至以明显错误的观念做标准讥讽他人,等等^{[93][94][95][96]}。无疑,这样做学问,不仅说明“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科学作风的问题,更涉及到了如何做人的问题。

“君子知其可知,不知其不可知。不知其可知则愚,知其不可知则凿。”(《呻吟语》)其实,学问是抓来的,无知不可怕,只要敦厚朴实,勤奋学习就可获得真知;可怕的是自命不凡,浅薄浮华,不学无术,洋洋得意。因此,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领域,抓基础研究很重要,抓学风建设更重要,抓修身立节尤其重要。

本文为贾兰坡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笔者是贾先生1965年招收的专修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生,曾跟随先生20余载,虽然获得了研究生毕业文凭,但名过其实,深感对旧石器时代的认识实在微乎其微而且非常肤浅。贾先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老一辈科学家,自学成才,一生勤奋好学,追求真

理,坚韧不拔,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贡献有目共睹,很值得后人学习借鉴。贾兰坡先生突出贡献主要有三:1)理论上率先突破北京猿人“最古论”,认为北京猿人文化不是最古老的文化;实践方面首先报道了中国发现早更新世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即西侯度遗址。2)提出了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说,为后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文化的系统和区划奠定了学说基础。3)建立了细石器在全世界的两个分布体系,并且提出华北可能是东亚、东北亚和北美细石器的发源地^[9]。贾兰坡先生,晚年辉煌鼎盛,本来可以借光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方面更有造化,可惜错失良机,在一片颂扬声中只成为淘宝人开采的资源。

目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各个方面都有显著进展。但是,科学的发展,无不需要历史借鉴。本文对西侯度石制品研究及其有关的问题,就事论事,粗浅分析点评。其看法,纯属一孔之见,望乞有识之士不吝指教。文章内容虽然不可避免涉及一些人事,但毫无意思褒贬任何一个人,更无意思参与任何学术或人事门派之争。

本文修改过程中,陈哲英、王益人、沈辰、陈淳、刘景芝、陆庆五、张法奎、卫星、张爱兰和贾真秀等给予许多有益帮助和善意忠告,值此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1]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匭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五号。科学出版社,1962。

[2][10][46][60][68]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

[3] Zhu, Rixiang, Zhisheng An, Richard Portts and Kenneth Hoffman. Magnetostratigraphic dating of early humans in China [J]. Earth- Science Reviews, 2003, 61: 341- 359.

[4][29][45][47][64][67] 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98) 17 卷 2 期。

[5][22][31][55][65][74][85][89] 李炎贤《从西侯度石制品剖析石制品鉴定的误区》,《龙骨坡史前文化志》4 卷, 2002。

[6][23][56][75][86] 李炎贤《关于西侯度的石制品的讨论》。Lee Yong- jo (ed.), Palaeolithic Man's Lives and Their Sites - Commemorating 40 years for Palaeolithic Sites. 韩国: 学术文化社. 2003, 255- 278.

[7][26]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古生物志, 新丁种第 12 号。科学出版社, 1985。

[8] 卫奇《裴文中与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高星和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 100 周年》。科学出版社, 2004。

[9]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11] 李壮伟、尤玉柱《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 3 期。

[12] 贾兰坡《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第六章)》。吴汝康、吴新智和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 1989。

[13][61][72] 陈哲英《关于〈西侯度〉存在的问题》《龙骨坡史前文化志》2 卷, 2000。

[14] 王建、王益人《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吕遵谔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 2004。

[15][30] 王益人《远古遗踪——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发现始末》《发现山西——考古人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16] 黄慰文、侯亚梅《关于环太平洋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文物季刊》1996 年 1 期。

[17][37] Clark, J.D., K.D. Schick. Context and content: impressions of Palaeolithic sites and assemblag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88, 17: 439- 448.

[18][35][36][78] 卫奇《〈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人类学学报》(2000) 19 卷 2 期。

[19][32] 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20][84] 李炎贤《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 17 卷 3 期。

[21][33] 李炎贤《中国早更新世人类活动的信息》。徐钦琦等主编《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祝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9。

[24] Aigner, J.S.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North China[A]. Fumiko Ikawa- Smith (ed.):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Mouton Publishers, 1978, 163- 232.

[25] Li Yanxian. Le Paléolithique inférieur en Chine de Nord[J]. L'Anthropologie(Paris), 1983, 87(2): 185- 199.

[27][90]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1990) 9 卷 4 期。

[28] 张森水《在中国寻找第一把石刀》《人类学学报》(1997) 16 卷 2 期。

[34] 东方善霸《丑陋的学术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

[38] 冯兴无、侯亚梅《泥河湾盆地霍家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8)17卷4期。

[39] 裴文《龙骨山的变迁》《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2期。

[40] 裴文《中国猿人究竟是否最原始的“人”——答吴汝康、贾兰坡二先生和其他同志》《新建设》1962年4期。

[41] 贾兰坡《中国猿人不是最原始的人——再与裴文中先生商榷》《新建设》1962年7期。

[42] 贾兰坡《和邱中郎同志讨论匠河文化遗址的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6卷3期。

[43] 邱中郎《匠河文化遗址的时代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6卷3期。

[44] 卫奇、陈哲英《匠河遗址群考证》《人类学学报》(2004)23卷增刊。

[48] 尤玉柱、汤英俊、李毅《泥河湾组旧石器的发现》,《中国第四纪研究》1980)5卷1期。

[49][50][52][93] 李炎贤《回忆裴文中先生二三事》,高星和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科学出版社,2004。

[51] 贾兰坡《中国猿人(北京人)》,龙门联合书局,1950。

[53][87][94] 卫奇《关于石片台面研究问题的问题》,《文物春秋》2006年4期。

[54][62][88][95] 卫奇《就石片台面研究问题答李炎贤》《江汉考古》2006年4期。

[57] 爪村石制品最早被确认的文字资料见1983年卫奇和文本亨编印的《中国古人类旧石器地点概要》(油印本)。

[58] 裴文《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59]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科学通报》1957年1期。

[63][80][81][96] 卫奇《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检讨》,芹沢长介先生追悼论文集刊行会编《芹沢长介先生追悼考古·民族·历史学论丛》。东京都,六一书房,2008。

[66] 李炎贤《关于石片台面研究的一些问题——兼与卫奇先生商榷》《江汉考古》2004年2期。

[69] 裴文《“曙石器”问题回顾——并论中国猿人文化的一些问题》《新建设》1961年7期。

[70]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18卷3期。

[71] [72]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邓涛等主编《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

[73] 卫奇《挑战人猿分属别之论》《化石》2008年1期。

[76] 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79] 贾兰坡、黄慰文、卫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82] 卫奇《旧石器分类探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庆祝吕遵谔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五十五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

[83] Brain, C. K. and A. Sillen. Evidence from the Swartkrans cave from the earliest use of fire [J]. Nature, 1988, 36: 464-466.

[91] 张森水《近20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进展与思考》《第四纪研究》2002)22卷1期。

[92] 王益人、王建《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

[97] 黄慰、卫奇《编后记》《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